

核心提示

李建森是河南新密市的一位普通农民,他在认真耕耘属于他那一亩三分地的同时,30多年来还一直在坚守着他的文学梦。

他的文学作品引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作家的欣赏,曾获得首届“梁斌文学奖”和《中国作家》文学奖。被郑州市文联聘为第一届签约作家,而且还被河南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他用那双布满了老茧的双手和秃秃的笔尖,描绘着农村中点点滴滴琐事。

30多年过去了,坚持依旧,贫困依然,文学并未能改变他的命运。但他用质朴、细腻、带着泥土气味的文字敲动了众多读者的心灵。然而,命运似乎跟他一直在开玩笑,人生的每次转折都把他推向灰色的生活深渊。但他并未因此而屈服,依然在坚守着一个农民作家的文化苦旅。

苦难

他称自己是头驴,一直不停地驮着苦难和心灵的折磨在迷茫地奔跑。最终,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拴他的地方——那一亩三分地。讥讽依旧,迷茫依然,困惑和内心的煎熬敲击着他的灵魂。

他被拴在那里打转,倔强坚硬的蹄踏踏出一串串文字,敲打着阅读者的心灵。这就是李建森,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作家。

第一次见到李建森,他的右脚一瘸一拐地,走路像是在跳舞。憨厚的微笑,用力的握手,算是见面的开场白。这个49岁的农村庄稼汉,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显得很拘谨。我倒了杯水递给他,他道了声“谢谢”。

现在,他已经失业两年了。确切地说,他根本就失业过,唯一称得上就业的就是,他在土改后分到了几亩薄田,至今仍由妻子在耕种。说他失业也对,因为自从2008年那场车祸发生后,落下了个右脚残疾,以前还能在煤矿挖煤挣点钱的他,现在没人愿意用他这个残疾人了。好在他弟弟在县城开了家小婚庆公司,看他实在可怜,就收留下了这个残疾哥哥,有的时候他去帮帮忙,一个月500来块钱。一日三餐都是在路边街头,花一两块买点馒头充饥。住则是免费的,一个文友提供了个小屋子。

对此生活,李建森已经很满足了。他觉得肚子能填饱了,并且还有个避风雨的窝。

这与他以前生活相比,确实好多了。这个出生在吃不饱穿不暖年代的汉子,苦难伴随了他大半生。

16岁那年,考大学落榜后。他开始走出家门四处打工,新密那时候已有耐火厂,他跑到厂里当烧窑工。上千高温的烧烤,使他练就了至今再热的天气他也不会出汗。

耐火厂后来因经营不善倒闭了,他又到煤矿打工。由于年龄小,老板可怜他,让他留在了地面的矿口边驮煤,像驴一样使唤。干了一年多,矿出了事,砸死了几个矿工,老板跑了。他连工资都没讨到,扛着铺盖回到了家。

在父母的张罗下,他听天由命匆忙地结了婚。婚后,他再次离家到一个水泥厂打工,开始了扛水泥包的重体力活。他得拼命干,因为要养活家里人。

三年时光一晃而过,两个儿子也相继出生。这又给原本贫困的家庭生活增添了一份重担,他只好再次返回到煤矿,当起了井下挖煤工。

在那个年代,井下挖煤是非常苦的,工资很低,安全又很差。干了两年后,他主动提出了辞职。

他拿着用血汗换来的工钱,回到家给老婆孩子盖了个房子。他认为这是他至今唯一做的一件大事。他觉得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最起码的是能给老婆和孩子一个安稳的窝。

迷茫

窝,建起了。可一家人要吃饭啊,无奈的李建森再次被迫选择了漂泊。他来到新密县城,开始了自己打零工的生活。

飘零的日子,苦难的人生经历,把他压抑得喘不过气,内心那股躁动不安的感觉让他很难受。每当夜深人静时,他躺在街头的屋檐下翻来覆去睡不着。李建森的生活失去了方向,屋檐下那昏暗的街灯照亮了他的人生之路。摇曳的灯光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

迷茫,占据了整个心灵。

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李建森开始拿起了笔,写心中的话。他把手中的笔当成了自己的知己和朋友,用来倾诉。他在捡来的废纸上开始写一些文章。

自此,他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从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觉得写小说很好玩,写出了热情。村里人都知道他他在写小说,他们不屑于他,便嘲弄般地叫他“李小说”。他说,他们叫我像叫头驴一样,随便他们怎么叫去,我不在乎他们怎么叫。其间,他也写过电影,村上人就是叫他“李电影”,他也不反对,他不管他们,只管写他的小说。他写得写小说投资少,成本



李建成在家中创作小说

低,买几本稿纸,弄一支笔,一罐钢笔水,桌前一坐,就可以划拉。再一个没什么风险,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砖头、石头也砸不着。投出去,用了用,不用拉倒,也就是费些稿纸、几张邮票,世上没有比写小说再好的活了。

村里人看不惯他,看他他们也不顺眼。他对我说:“先前他们村的万兴,去煤矿挖煤,冒顶给砸死了。后来的马兵,瓦斯爆炸,捡了条命,落了一身疤。罗全有在建筑工地摔断了腿,成了个瘸子。胡大娃去修路,两年了工资还没要回来……这样的事多得很。这样一比较,就显出来了写小说,是比较客观、科学的选择。看来选择对一个人来说真是很重要。一个念头,一个主意,要么前面就是一条直溜的宽阔大道,要么就是一道看不见底的深渊,一抬脚,就全都都没了。”

他说,农村这地方,随便找个岔儿,就能翻出故事来,一串串的,比辣椒还红,比玉米还黄,比棉花还白,比煤还黑。张三、李四、王麻子、钱妮、马姐、宋寡妇,他们说的话没城里人说的好听,却有一股子红薯、萝卜味。不是白开水大白话,听了便能长在你的心里,没准来

年就是一棵大萝卜。写这些,当然不是白写,像种麦、种玉米,不是白种,每次从邮局出来,拿着稿费,我的腰杆挺得跟玉米秆一样直,黑皮鞋铿锵的声音能把县城大街两旁的树叶都震落下来。

可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他的脑子里长满了草,荒得一场糊涂,风一刮,呼呼啦啦作响。他瞪着干涩的两眼,把农村这块地方重新打量了一番,觉得写小说越来越没意思了,跟吃肉一样,越吃越腻,越吃越没味,越吃越难受。黑天睡不着觉,白天没精神,恨不得掂刀把小说给杀了。杀了,扔进地里,给他的庄稼做肥料。

后来,他真把小说给杀了,在他写的一页页小说稿纸上,打了一个又一个x,装到一个袋子里,提到他的地里,划一根火柴给点着了。小说变成了一把灰,撒进了地里。他相信,往后他地里的粮食产量肯定会高产,一粒粒的麦子、玉米,经过汉字的孕育和阳光的照耀,吃到肚子里都是维生素、蛋白质,排出来的都是万事如意、平安吉祥。

可这一切都是缥缈的理想,别人说他疯了。后来,一位来自广州的艾云女士到郑州开会,她有些好奇,想看看他的脸黑不黑。

在一间办公室里,她看着他的脸看了一阵,微微笑了,掏出笔和日记本,问他家的母鸡一天下几个蛋,猪饿到什么程度才会哼哼,麦子一穗能长多少粒,玉米究竟能比人高多少等,她记了不少页码。她还想去他那个村庄,体验一下“一吨钝斧砍在手臂,受伤中那蓝色的血脉流淌时眩晕的快感。”听听母鸡下蛋后咯咯声抑扬顿挫的韵味,看看村庄里的狗吠不咬她这个城里人。合上了日记本,艾云问他:“听说你还写小说?”他说:“好长时间没写了?”她说:“怎么不写了呢?还应该写下去。”

因为艾云的话,也许因为艾云的微笑,从郑州回来,他又开始写小说了。

挣扎

李建森又开始写小说了,就像驴又开始驮着重物继续前进一样。只是他把小说杀过后,终于明白了很多。他学会了如何坦然面对这个社会和生活。

车祸致使他终身残疾,开始了自己并非如愿的“舞蹈生活”。然而,他的生活却是越舞越尴尬,越窘迫。但文字却舞出了人生的精彩和辉煌。

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因为这对他来讲是奢侈的生活,不如把这些钱省下来给老娘买些急需的药,或者是买个馒头。

他的老娘今年已经71岁高龄,身患多种疾病。为了给老娘治病,他背着老娘跑了很多地方,花费了很多钱。可对此,他并不在乎,他没

钱,但为了老娘的病,他不怕花钱。他对我说:“每个人的老娘,都是自己的根。”说这话时,他表情非常凝重,非常认真。

他觉得最对不起的是两个孩子和妻子,他说:“自己没什么本事,没能给他们很好的生活,老婆从未说过他什么。但是现在,两个孩子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因为家里穷,大儿子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了,现在在郑州打工,二儿子在家附近读技校。”

谈起儿子,这位朴实的汉子泪水在眼中打着转。他说:“大儿子到现在在郑州干啥我也不知道,他几乎不回来,回来也不跟我说话。二儿子在技校学玉雕技术,也很少回来。现在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可能是嫌我这个当爹的没什么本事吧。唉!他们也大了,我也管不了他们了,只要他们能遵纪守法,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就好。”

一上午的访谈结束了,中午几个朋友约在一起吃饭。我让他一起去,他一再推脱。最后,他从我的眼神中读出了我的真诚。朋友来车接着我们,拉到了县城郊区的一个农家院。满桌下酒菜上来后,我和朋友一起畅谈,而他却独坐在桌边饮酒。酒,一直到最后,还是他面前那满满的一杯酒。

主食捞面上来了,他捧起碗呼噜大吃起来。那天中午,满桌丰盛的菜肴他没动筷子,满满的酒杯他没端起尝一口。只吃了碗面,喝了几杯茶。

吃过午饭,朋友开车拉我和他回家看看,他尴尬地说了句:“别去了吧,也没啥看的。”

在我的坚持下,最终他也坐上了车,引着路疾驰向那个叫甘寨村的村庄驶去。

一路上,他沉默不语。车快到村子的时候,他说:“兄弟,咱们走着过去吧。这样开着车邻居们看到了会笑话我,他们又该说我,驴写小说当官了啊。”

我和朋友听后不知该如何回答,停好车,跟在他屁股后面在阡陌交错的田埂上走着。低矮的围墙,圈起的一个小院子,一栋二层破旧小楼是他的家。屋中除了两张床还有别人送的一张桌椅,其他的就剩下了日常生活器具。

妻子朱瑞芳从屋中走出来,憨厚地说了句“来了”,就再也说不了话。简单看过后,我们提出要返程。他说:“再坐会吧。”我们婉言谢绝后便离开了。

走在村头的小路上,我们回头望去。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映入眼帘,他已在家后的田地里挥舞着锄头耕种。不知道是不是在刨已经被他杀死过的小说。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sxzw@zynews.com

社会压力不是道德下滑的“烂菜筐”

最近,一则新闻刺激了公众的神经:九成80后无法养父母。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有将近七成的家庭存在着“老养小”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第一代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其父母也日渐迈入老年人行列,“421”家庭时代降临,本已深感生存压力的80后无力照顾老人的矛盾越发突出。《现代快报》10月25日

其实,大部分80后的父母都只是刚刚退休,有的还在岗位上,还能谋生。这个年纪,还不到需要子女赡养和照顾的“地步”。而事实上,现在概念上的“80后”,不过是对青年人人的泛称——对于刚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人来说,谋生的压力相对较大,有些甚至还需要父母资助接济,如果要买房结婚,更是需要倾尽全家几代人的积蓄。基于社会传统和国情,“老养小”的现象也很正常。

我们是一个极重视血亲和人情的社会,有困难找父母,这是自然而朴素的本能。短时间的“老养小”本是社会常态,何止80后,50后、60后和70后们,哪一代人没有经过“成家立业”的艰难过渡期?现在“无法养父母”不代表以后也“无法养”,大概还构不成一个“社会问题”吧。但时下,舆论却反复在讨论着这样一个命题:生存压力极大的80后该如何担负起养老的重任?80后整体不孝?如是“结果”令人疑惑,而接下来,无论是“80后”们自身还是公共舆论,都将矛头对准了生存压力。不要说普通人的报道中有一位月入过万的高收入白领还声嘶力竭地喊着“紧巴巴”,赡养父母的压力很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就是“鸭梨”太大,无力孝养父母。

社会压力真是成了一个道德下滑和规避责任的“烂菜筐”,啥都想往里装。就业压力下女大学生傍大款狂婚找出路,社会压力下80后整体无力赡养父母……这样下去,银铛入狱的贪官没准也会发出长叹一声:不是我想贪,实在是生活压力太大呀!

穷人有钱人的日子,富人有富人的活法,难道天底下的穷人都就放弃赡养父母的义务?80后生活压力大,上一辈的70后、60后的压力就小了?是不是可以说种种理由和借口,去逃避赡养父母的责任?说到底,这终究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态在作祟,故意放大“鸭梨”的问题,然后为逃避责任进行道德粉饰。穷困的父母可以勒紧裤腰带抚养孩子成人,但反过来,子女就不能为赡养老人承担一点“鸭梨”——着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在这个欲望被无节制消费的年月,传统的孝养成了被偶尔拿出来打磨的消遣情怀,明明失去了什么,却偏偏抱怨怨社会“压”给了太多——如此“九成80后无法养父母”的貌似悲情,以及“80后整体不孝归咎于社会压力太大”的故作姿态,混杂在一起,令人闻之而无语凝噎。 陈一舟

“工资涨不过物价”是最大的经济风险

最近“涨”声一片,国庆节后,中国食糖价格创历史新高,食糖批发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70%;食用豆油开始新一轮涨价的消息刚出,国家发改委决定自本月26日零时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30元与220元。而最近,各类农产品和水电气等资源产品也都在或者已经完成了上涨。

今年第三季度的CPI是3.6%,创下23个月来的新高。通胀的风险显而易见,处于负利率时代之中,蓦然发现周围基本上没有不涨价的东西了。其实,回头来看看,在过去的2009年、2008年乃至更早,类似的涨价场景几乎每年都要上演。

有媒体这样戏称:工资好比眉毛短,物价犹如头发长。切入现实的语境下,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都在涨,只有工资不涨”。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向好,国家控制通胀的信心很大,“GDP增幅多少”、“CPI是高还是低”……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乏味和看不懂的经济术语,很多人甚至至今也没有搞清楚,CPI跟自己的

生活究竟有什么切身关系。真正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是活生生的现实——物价上涨,特别是生活基础商品价格的暴涨,严重超越了工资上涨的幅度和速度,就构成了“负增长”,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碗牛肉面的上涨,都可以引起舆论的关注讨论。

在频频走高的物价面前,“工资增长”显得是那么的空洞和没有说服力。在国内劳动力成本占生产力的比重长期低迷,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大背景下,大多数基层劳动者获得的仍然是较低的劳动报酬,有些甚至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因而在涨声一片的物价指数下,本来就很不滋润的日子就变得愈加捉襟见肘和难以维持。

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而工资收入却是相对意义上的“负增长”,民众生存的压力可想而知。生存的压力下,消费的能力势必进一步萎

缩。由大量投资和房地产业膨胀发展带动起的GDP数字增长,由少数富裕群体消费“扩大”的内需繁荣,因为离开了民间消费的同步增长,并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工资涨不过物价”是一种最大的经济风险——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社会化体现,是社会分配制度不公的集中反映。而事实上,之所以出现“工资跑不赢物价”的现象,追根究底,原因正在于工资增长与物价指数增长的配套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刚性调节的制度——说到底,还是社会分配制度存有缺陷。

当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为“十二五”规划破题定调。“十二五”规划显示,在未来五年中,中国经济会更注重“质量的发展”,会更涵盖内需的挖掘和民生的福祉。不论是提振内需,还是推进制度改革改善民生,彻底消弭和化解“工资涨不过物价”的经济风险,都是应有的题中之意。对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王艳

“李刚事件”背后是无法收拾的人心

网络越来越肃静,生活越来越无趣;幸好“李刚”驾到。“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我爸是李刚。”“不是每一个爸爸都是李刚。”“撞人恒久远,李刚永流传。”“此情可待成追忆,只因我爸是李刚。”“给我一个李刚,我能撑起整个地球。”几天之间,网络出现了不下于36万多条关于李刚的“造句”,唐诗、宋词、歌曲乃至广告语,无一不被网友们改成“李刚版”。这真是:“李刚”一出,谁与争锋!

李刚者,乃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几天前,其子李启铭酒后在校内飙车,将两名女生撞飞,致一死一重伤。在被拦下后,他口出狂言:“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是李刚!”这引起了网友的极大愤慨与关注。值此不难看出,那不下于36万多条关于李刚的“造句”,不是一种娱乐化事件,而是人们自发形成的对权力阶层的一种声讨。

显然,这种声讨早已不限于“李衡内”的酒驾撞人本身。车祸效应开始席卷李刚及河北大学校长。有网帖表示,在保定市,李刚名下有两套房产,李启铭名下有3套房产。意外卷入的还有河北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王洪瑞。因为学校师生被打招呼不能接受采访,网民开始将愤怒指向了学校校长。记者调查发现,新语丝曾连续发文揭露王洪瑞的两本著作和博士论文均为抄袭之作,且曝光至今,其未有任何解释与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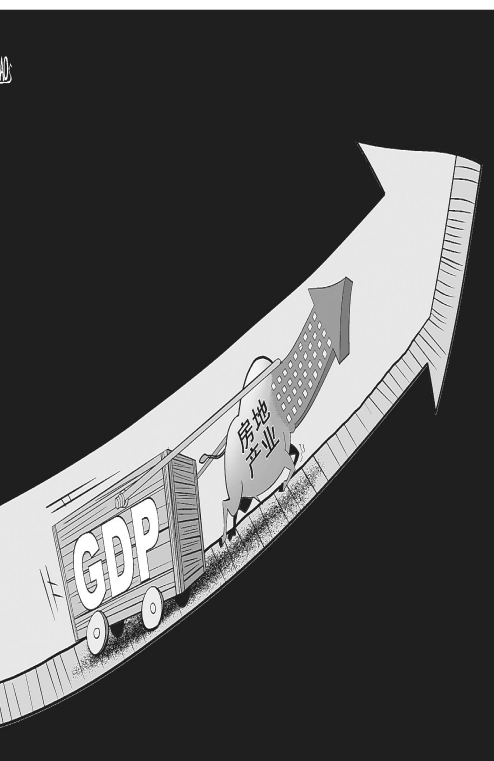
“过去说没带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友这样形容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如果这一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它是不是也暗含了另

一层意思,那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以屎为香”的“逐臭”时代?无论是肇事者对生命的漠然,对法律之轻蔑,还是校方对言论自由权利之封阻,以及校长本人的抄袭与沉默,都是这个社会之“屎”,但问题在于有多少人以为为臭,反以为香?

假如我要用“李刚”造句,我更想写下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刚”。在这一语境之下,“李刚”不是被带出来的“屎”,而是一种甚嚣尘上的特权思维。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一种“权力通吃”的社会特性,这足以解释“拼爹游戏”为何成为浩然大势,师生封口如何可能,而区内一名公务员却为何拥有那么多房产的原因。

“我爸是李刚”不是一种口不择言,实则是下意识发作。不得不承认,我们社会培养了官二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适宜其生长的土壤。不得不承认,一种社会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个社会就会真正流行什么。“我爸是李刚”式的宣告、声明或抵抗,正是这样的一种流行。因此,由一起官二代校园肇事事件,引发的对李刚财产问题的曝光,对王洪瑞抄袭问题的质疑,仍不是公众声讨的最终指向。它的最终指向,只能是一个社会规则、道德及人权的溃败。这不仅是权力通吃所制造的溃败,更是溃败引发的进一步的权力通吃。

“李刚”意味着一种病毒。它存在于这个社会体制的深处,也同样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刚”不是李启铭的李刚,它很可能是所有人的李刚。这跟那些看似基于正义的声讨与谴责无关。这是无法收拾的人心。 杨耕身



快到头了!

25日,社科院在京发布2010年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蓝皮书指出,中国力争2020年进入G20五强,205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而实现目标应采取的

战略是“梯次追赶”。蓝皮书指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发展,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缺乏竞争力,必须立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结构竞争力。 焦海洋/图

用什么修复官员的形象和底线

21日的《南方周末》在“时局版”刊发了一篇有趣的小说体奇文,讲的是官员“被规定的纪律化生存”:一个姓严名守纪的虚拟官员,从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国土资源局干起,后到基层挂职锻炼,科级国土资源局、县长、县委书记、市委统战部长,一路走来在市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每走一步,这位“严守纪”同志都严格按照规章和纪律文件生活,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躲躲闪闪,但还是免不了几回“湿鞋”,“诱惑太多,陷阱太大”。

小说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勾勒了“严格遵守党纪”状态下官员应该有的生存状态。根据统计,中共十五大到2008年的11年间,中央及各省市制定的事关党纪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超过了3000件,这些纪律法规细致入微地规范了官员的工作生活,如果官员们完全遵守纪律,是一个纯洁得不能再纯洁的状态;而观照于当下的社会积弊,无不是洞穿这张恢恢“红网”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就在同期媒体上,揭露了上海市房管局一副局长引爆的房地管理系统官员通过超低折扣拥有多套房产的消息——上海市2000市管干部被自觉申报房产,结果许多官员在“谨慎”之后还上报了十几套房子,以至于最初纪检部门打算对低价购房优惠超过50万元的官员房产逐一审查,后因工作量太大而不得不改成100万元。同样是这两天,河北大学撞人事件中的李刚父子被爆出有多套房产——网民几乎很快就相信了。想想看,从周久耕开始,那个“撞到枪口”的官员经过法纪标尺一卡,找出几个长期潜伏的“罪过”?

这让人想起“破窗原理”,当有一些法律纪律在现实面前被砸碎了玻璃,却未及时修补的时候,更多的砸玻璃事件就会上演,在纪律“红网”被一再戳破面前,要做个“严守纪”的人竟然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君不见不收回扣的医生被戴上“人格障碍”的高帽子吗?君不见不肯顺从官场规则的姜宗福被讥讽为“官场风姐”吗?

按照吴思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官场底线的边界“变老”是个普遍规律:随着年龄的增加,某些限定性的行为边界总要朝向有利于官员的方向移动。而严守纪的故事,就在一条一条地告诉大家——司空见惯的那些官场规则与潜规则,是不应该存在的,是不被纪律所容忍的。我们的困境则在于:面对一再变老、一再被洞穿的底线,我们如何修复,又拿什么修复? 毕诗成